

旧纸堆里的三代“侨”缘

□ 邓雨迪

在一起的还有爷爷奶奶当年回国时

带回来的旧护照、船票、印尼雅加达巴城中学和棉兰华侨中学的学生证,而几张卷角残破的粮票、食用油票、布票,于我而言虽然恍若隔世,却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特殊记忆,也真实反映了他们回国后的艰难岁月。

我的目光转移到几张面值不一的泛黄票证上,这是侨汇券,爷爷曾经跟我说过它的故事。现在很多人连听都没听说过侨汇券这东西,而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那可是人人求之不得的好东西。如果你手上持有一些外汇券,特有面子。改革开放初期,来中国访问或探亲的外国人、华侨华人和港澳同胞日益增多,而当时市场供应还非常紧张。为满足这些人的需要,便于海外、境外人士在国内消费,同时又区别于国内居民,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中国银行发行了外汇兑换券。外籍人士或海外华侨须将所持外币在中国银行或指定的外汇代兑点换成外汇券,并在指定范围内与人民币等值使用。

1981年,我的外曾祖母第一次从印尼棉兰回国探亲,她返程前还有一些未用完的外汇兑换券。当时,中山路有一家友谊商店,有点像现在的免税店,客户凭外汇兑换券或侨汇券可以买到当时非常紧俏的进口商品,比如电视机、电冰箱等,而且价格很实惠。爷爷和奶奶就用外曾祖母的护照和这些外汇券,购买了一台

市场上极难见到的原装日立十六寸彩色电视机。这台彩电的市场价1800多元,差不多相当于爷爷一年多的工资收入。爷爷和爸爸都是铁杆的体育迷,这台电视也伴随着他们见证了许多历史性的时刻——女排五连冠、许海峰首金、北京亚运会成功举办等。1994年,爸爸和妈妈喜结连理,此时,这台电视机以及那些侨汇券,也基本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再翻查下去,终于有了与我有关的“印迹”:两份保险单和几张存折。保单是我出生时爸爸给我买的人寿保险的少儿教育险,存折是用于我读幼儿园、小学的学费和日常的一些开销,虽然保险合同已经满期,存折也已销户久未用,但依旧完好地保存着。上面的一行行条款,一项项收支,记录着我童年生活的点点滴滴,唤起许多往事。

时间跨入新世纪的2000年,与我的振兴幼儿园入学通知书夹在一起的,是爷爷和爸爸父子俩联袂参加厦门市第十二次侨代会的代表证。听老爸说,他就是因为参加了这次大会,因缘际会地从经济部门调到侨务部门,从此开启了迄今将近20年的侨务工作生涯。

这个“百宝

箱”如果再凑上妈妈2005年加入致公党的通知书,和我2018年3月以归侨侨眷界别代表身份参加厦门市第十八次团代会的代表证,我们一家三代与“侨”结缘的“证据链”可不就完整齐全了吗?它也真真切切地展现了我们家庭在过去20年的种种发展变化。

箱子的那些旧物,从剪报、信件、证书到侨汇券、布票粮票再到存折、银行卡,无不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侨界儿女70年风雨同舟,与祖国同甘共命运的赤子情怀,也见证了祖国从建国之初的百废待兴到如今屹立于世界之巅,走向繁荣富强的光辉历程。在祖国七十华诞之际,身为归侨的后代,我感到了无上的光荣与自豪!这份弥足珍贵的侨缘,将激励我沿着祖辈的足迹,弘扬侨的情怀,传承侨的基因,继续书写属于新时期归侨侨眷的追梦历程、理想信念与家国情怀!



95后侨三代邓雨迪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和我的祖国》这首脍炙人口的红歌,在新中国诞生七十周年之际,再一次响彻祖国的大江南北。优美生动、朴实真挚的词调,唱出了人们对于祖国的深深依恋和真诚歌颂,更唱出了中华儿女心中的无比自豪感。我,一个生长在与“侨”有着不解之缘家庭的“95后”,更是别有一番感触在心头。

今年“五一”放假期间,我在老

房子整理旧物品,无意中翻出了一箱让人回味无穷的东西。先映入眼帘的是我爷爷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写的登载在《鹭风报》的一篇文章——《风雨人生报国路》。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同样来自印尼的爷爷和奶奶怀着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告别了温暖的家乡,告别了亲爱的父母兄长,登上回国的邮轮,投向日夜思念的祖国母亲的怀抱,决心把自己的一生献给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回国后,他们经过侨校的中文补习,都顺利考上了厦门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也都留在厦门成为了光荣的人民教师,此后的几十年,在教育战线上为祖国奉献着自己的力量。

与报纸夹杂



外汇券



旧奖状

我的18岁、81岁,直到这一生……

□ 何敦夫(香港)

一个归侨的一生,心中永远烙印着“爱国”这一崇高信仰。

18岁,我走上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场;

81岁,我高举五星红旗,反对港独,走在香港的大街上;

坚持爱国的崇高信仰,直到走完一个爱国归侨的一生,我都将无怨无悔。

我1935年5月18日生于海南文昌。儿时随父移居新加坡,中学就读新加坡著名的、由琼籍侨领创办的育英中学。

1949年,新中国即将于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宣布成立的消息传来,新加坡育英中学校园一片轰动。

“新中国成立啦!”“中国人民站起来啦!”同学们激情澎湃,奔走相告。操场上,人们敲锣打鼓,扭起秧歌,一片欢腾。

在学校办公室。老师和同学们围着校长王昌稚辩论,要求新中国成立日,一定要升五星红旗和挂毛泽东主席像。校长不肯,怕

出事,大家据理力争,最后校长说“我不管了,你们谁做,谁负责!”说完转身走了。

于是,爱国的同学们积极行动起来。五星红旗,是由初二年级同学汪佩珍,和二姐佩云、四妹佩琴三姐妹连夜通宵赶绣出来的。学校正门大旗杆是初三年级陈兆祥、何业船等同学树起来的,并把五星红旗升上去。新加坡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终于在一群华侨青少年的手中升起来了!国旗在蓝天映衬下迎风飘扬,全校学生热血沸腾。

学校大礼堂里,挂起五星红旗,挂起毛泽东主席像。歌咏队在队长陈永春同学指挥下,高唱国歌。大家兴高采烈地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英帝国统治下的新加坡殖民地,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第一次挂起毛泽东主席像,这是我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

1950年冬,我和表兄从新加

坡乘船回国。到了海南海口,看到岸上的五星红旗,我激动地高声欢呼:“祖国,我回来啦!”

不久,我考入广州石牌“南方大学”,校长是叶钊英。从学校又被保送到空军、北京南苑机场、第六航空学校,毕业后分配到东北空军,任米格战机机械师。1952参加抗美援朝作战,那年,我18岁。

1958年,我转业到杭州半山重型机械厂技术处任技术员。后调到杭州汽车制造厂四金工车间任技术员。生产“钱塘江牌”汽车。在历经“四清”社会主义教育、多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后,1975年冬,我被批准出国探亲,后留居香港至今。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我正好60岁。我见证了湾仔会展中心举行的香港回归仪式的全过程。那天,我和香港民众一道,亲眼看到香港特区区旗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一刻,我的脑海中忆

起1949年10月1日在新加坡育英中学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情景,无比激动。这些场景都是我终生难忘的。

香港回归后,我和广大归侨一起,积极投入到维护香港的安定繁荣战斗中。上街游行,反对“占中”,高举五星红旗,反对“港独”。我们小组十多人,在中环地铁站口、电车站口、天桥路口,派发“守护中环”传单,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从早上九点钟到晚上七点钟,发出约2万份传单。当时《文汇报》记者到现场采访,给我拍了一张相片。这一年,我81岁。

如今我83岁了,个人的生活和环境的变化很多,唯一不变的就是永生爱国的信仰。作为一名普通归侨,我没有十分传奇或显赫的业绩,但是我心中对祖国充满眷恋,国旗是祖国的神圣标志,我为她感到自豪与光荣。



1949年10月1日新加坡育英中学,七(七)班,升旗仪式,何敦夫(前排左二)、陈永春(前排左一)、汪佩珍(前排左三)、何业船(前排左四)等同学参加。



何敦夫(前排左二)在空军服役时的照片。



何敦夫(前排左二)在空军服役时的照片。



何敦夫(前排左二)在空军服役时的照片。



何敦夫(前排左二)在空军服役时的照片。



何敦夫(前排左二)在空军服役时的照片。